

乐清文献丛书

第三辑

林大椿集

■ [清]林大椿 著 ■ 赵挽澜 编注

线装书局

林大椿集

■ [清]林大椿 著 ■ 赵挽澜 编注

綫裝書局

《乐清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顾问：潘孝政 林晓锋 张亨利

学术顾问：钱志熙

主任：赵乐强

副主任：林霞 方青 徐扬 项宏志

委员：陈绍鲁 王爱芬 赵顺鹏 南晓燕 吴安武 黄元明

吴金汉 詹必华 张文兵

办公室主任：项宏志（兼）

办公室副主任：张文兵（兼） 许宗斌

办公室成员：何文军 詹恭学 南凝平 杨坚 郑清华 马永福 张炳勋

《乐清文献丛书》编辑部

主编：许宗斌

副主编：张炳勋

编辑部成员：马永福 周健

《乐清文献丛书》总序

乐清建县的历史有一千六百多年，但文化的繁荣是从南宋开始。此前的大约七个世纪，由于乐清地域偏僻，远离政治中心，教育落后，未能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群——士群，精英文化的创造几乎是个空白，有的只是少数几个外来知识分子——谢灵运、沈佺期、孟浩然、张子容等，留下几首诗；本土人士中略有名气的就是一位半传说人物张文君和唐代白鹤寺的两个僧人。

唐末五代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大批世族南迁，其中颇有辗转迁至温州、乐清的。两宋之交，世族南迁形成一个新高潮，而早些时候即已开始的从文化较发达的福建地区向文化相对落后的浙南地区的移民也在继续进行中。加上北宋时期地方政府大兴科举教育开花结果，乐清的士群乃开始形成。南宋定都临安使温州从原先的边缘之地一变而为东南重镇，深度开发后的雁荡山又吸引了大批文人来游，留下大量诗文。这种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使乐清的文化在南宋形成了第一个辉煌期。北宋时期乐清中进士者仅一人，作家仅有女诗人钱文婉；南宋时期则有进士一百五十五人，同时，出现了一批成熟的诗人、作家、学者，其中较杰出的有王十朋、钱文子、翁卷、刘黻等。元承南宋余绪，乐清文人中有诗文大家李孝光和隐逸诗人朱希晦。

明代是乐清文化的第二个辉煌期。科名仅次于半壁江山的南宋，

士人入仕甚众，其间多有文章高手。章纶、朱谏、章玄应、侯一元、侯一麟、赵廷松、何白等均有较完整的诗文集留传后世。在诗文创作之外，朱谏是李白研究专家，何白是书画名家。为世所知的书画家还有李经敕。法学家有陈璋，火器专家有赵士桢（桢或作祯）。赵士桢在兵器研究上的成就得到了李约瑟的很高评价。明代乐清还出现了许多文化世家，如南阁章氏、瑶岙朱氏、蒲岐侯氏、高岙高氏、南郭陈氏、芙蓉蔡氏等，每个家族都形成了一个诗人、作家、学者群，有的绵延好多代，可与宋代白石钱氏、石船刘氏、柳川翁氏遥相辉映。

明清之交的战乱和清初的迁海令使乐清的经济和文化遭受重创，终有清一朝，乐清的科名一直不振，但这并不说明清代的乐清缺乏读书种子。事实上，在清朝中叶以后，乐清的学风又渐见恢复，涌现了许多新的文化世家，著述之风亦盛。只是与前代比较，清代的乐清作手多属布衣文人，可谓平民写作和边缘写作，因囿于经历和眼界，气象不逮前代作家，好处是其诗文中较多地方特色，足资研究乡邦历史。清末民初，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乐清知识分子中不乏慷慨之士，学风也为之一振，其间佼佼者如黄式苏、冯地造诸子，多有关心国事之作。

中国素有重史重文献的传统。地方文献蕴涵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是地域研究的宝贵文化资源，也是全国性研究的基础资料。遗憾的是，在历史上，许多文献产生了，又因种种原因散佚了。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对建县前的乐清、甚至对建县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乐清的历史面目不很清楚。北宋乐清女诗人钱文婉的诗集、由周必大作序的《箫台诗集》早已难觅踪影，文婉之曾侄孙钱文子众多著述中也仅有一部《补汉兵志》得以完整流传，北宋乐清县令袁采编纂的第一部乐清县志在明代就已经失传，当时与朱谏齐名的明代南阁诗人章玄梅的诗集在作者身后不久就散失了，令为朱谏刊刻遗著的王叔杲感慨万分。

有鉴于地方文献的易于湮灭，历代有识之士常以保存乡邦文献

为已任。例如清光绪时，我邑既有陈琰为刊刻先贤施元孚的著作而奔走，复有寒士郑一龙不顾高龄，以五年之功选辑《乐成诗录》。回顾温州近代较大规模的几次乡邦文献整理，诸如清同光间瑞安孙衣言氏汇刻《永嘉丛书》，民国初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黄群汇刻《敬乡楼丛书》，都收有乐清人的著作。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即抗战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简称“乡著会”）组织抄缮地方文献，乡先辈高谊先生参与其事，负责组织乐清片的文献征辑，抄录我邑先哲遗著多达一百多种。这些著作绝大部分从来未曾刊刻过，如果不是这次抄缮，可以想象到今天定已散佚殆尽。高谊先生为保存乐清历史文献作出的重大贡献，后人当永远铭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化的重要性也逐步为世人所认识，地方文献的整理重新得到重视。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六年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收入乐清籍作家、学者的著作计有《刘黻集》、《李孝光集校注》、《何白集》、侯一麟《龙门集》、赵士桢《神器谱》等五种。此前，由民间集资整理出版的有《王十朋全集》。更早的时候，翁卷的诗集作为《永嘉四灵诗集》的一个部分，列入《两浙作家文丛》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民间人士整理刊印的乐清文献也有一些，通常是取内部资料形式，其中包括《永乐乐清县志》。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头。现珍藏于温州图书馆的乡著会乐清文献抄本绝大部分还没得到整理。有些历史上曾刊刻过的著作，由于长久没有翻刻，存世极少，甚至已成孤本。一些文献资料和单篇作品散见于各种书籍，或仅闻于民间口耳相传，亟待集腋成裘，裒辑成书。系统性的分类文献汇编也有待进行。为此，乐清市文联具文向乐清市委、市人民政府报告，建议组织力量整理出版《乐清文献丛书》，得到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二〇〇六年乐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后，乐清市委、市政府指定由市社科联负责《乐清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并成立了《乐清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及办公室、编辑部。市人民政府将整理出版费用纳入

市财政预算，并将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作为我市文化大市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规划，大致将用五年时间完成《乐清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文献的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可以预料，《乐清文献丛书》陆续出版以后，将为乐清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既为市内外文史研究者提供资料上的便利，又可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份丰厚的精神食粮，为促进乐清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积累作出贡献，同时，也可以此告慰为乐清创造过辉煌历史文化的历代先贤于地下。

《乐清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〇八年十月

《乐清文献丛书》整理凡例

一、本丛书主要选收乐清本土学者、作家的著作，地域范围以现有辖区为准；兼收非本籍作者内容与乐清有关的著作。为避免重复，已经正式出版的著作不再收入，只列为存目。少数已出版但有必要重新整理，或原来未作笺注有必要加以笺注的，酌情收入。以收一九四九年前的著作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二、丛书包括个人专集或多人合集、诗文总集、地方史志、史料汇编等若干大类。分辑出版，每辑之内可几种类别混编。此外，为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另设《乐清文献丛书·普及书系》，作为文献丛书的子系列。普及书系选编凡例另拟。

三、采用简体横排印刷，若逢用简体易致歧义时，则用繁体。“馀”字简体一般作“余”不作“余”，但个别特殊情况除外，如“馀杭”、“馀姚”之类行政区域专名，鉴于简体已多年通行“余杭”、“余姚”，按约定俗成的原则不作改变。

四、个人诗文集的编法不求一律，如果已有旧编，可保留旧编体例，而将旧编未收的作品作为辑佚编入，也可将全部作品打散另行编排。存疑的作品另列。有关作者的背景资料和评论作为附录置于全书之后。

五、如有多种版本存世，选择时代较早、内容完整、校刻精良的版本为底本。整理时用其他版本通校，并选择其他书籍参校。各本文字与底本相同者，不再标出。与底本歧异者，若底本不误而他

本误，正文用底本，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出校；若他本文义较胜，则正文改从他本，在校语中注明原误作某、脱某字或衍某字；如各有所长，不能断定是非，则正文仍用底本，在校语中标出他本异文。有疑而无法解决者，加（？）或在校语中说明。

显著的版刻错误，根据上下文可以断定是非者，如“己”“巳”“已”的混同之类，不论有无版本依据，迳改而不出校记。

六、此次整理的乐清存世文献多为抄本，其中大部分只有一种文本传世，不存在底本选择问题。在抄写过程中出现的文字错误，诸如脱文、衍文、讹字等，若有其他文献可资参校的尽量予以校正，并在校语中加以说明；若无其他文献可资参校，整理者在有把握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正文中加以订正，并在校语中加以说明。

七、正文改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正文中加上校改符号：

- (1) 脱：在（）内补入脱漏的文字。
- (2) 衍：将衍字写在〈〉内。
- (3) 讹：在讹字后面用〔〕标出，写入改正的文字。
- (4) 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脱字，以□代替。

另一种是除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文字仍用□代替外，其他均不在正文中加校改符号，只在校语中加以说明。本丛书一般采用这种方式。

八、原本所用异体字、俗体字，凡无关文旨者，均改为通用字。宋代以前的古书和人名、地名及其他特定语境中的异体字，不能改为通用字。通假字一般不改，必要时可在注释中说明。

九、作者原文避本朝名讳及家讳者，一般不改，若影响理解文义，则出校说明。明清人传刻古书避当朝名讳而改，或引用古书以及称引前代专用名而避当朝名讳者，如“宏治”作“弘治”、“章玄应”作“章元应”，若有确据均改回原字，并在首见处出校说明，尔后径改，不再一一出校。缺笔字则补足笔划。

十、原本行文中按旧规所用的“抬头格”概予取消。

十一、文章分段排列。诗歌不分段（词片与片之间空两格），句

句接排，首行前空两格。诗一题数首者，一首一段，两首之间空行，不标各首序次。但总题下原有小标题或序号者（如“其一”“其二”），小标题或序号可予以保留。

十二、校注本的校记和注释一般不分列，校注文字一般置于正文每篇（题）之后，编号每篇（题）自为起讫。校注码列于正文右上角。如校记和注释分列，校记码和注释码要分用不同样式的码符，当校记码和注释码并列时，校记码在注释码前。校注条目很少或因著作体例特殊的，也可采取脚注、尾注形式。

原本若有注文，属作者自注者，无论夹注或尾注，概按原貌予以保留，以小于正文的字体排印，俾与正文区别开来。作者自注文字和正文一起进行校释。属他人所注者，是否保留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保留的他人注文，以“某某注”的形式列入现整理者的校注中。

十三、校语注释力求简明扼要。注释以人物、地名、事件和有关背景材料为主，属于语义、音读方面的内容一般不注。

十四、征引资料须详明出处。首次引用时按时（朝）代、撰编者、书名、卷次（或篇章名）、版本、页码为序标明；尔后引用只注撰编者、书名、卷次（或篇章名）、页码。先秦要籍、著名史书可省略撰编者之名。

十五、全书出现的数字，除括号里表示公元年代的其他个别特殊情况下可用阿拉伯数字外，均用汉字，卷次、页码的写法按古书惯例，如卷二五不作卷二十五，一一九页不作一百十九页。

十六、各书均须写出前言。前言内容包括作者评介、时代背景、对作品的评价、整理工作的有关事项等。有些问题如不适宜写进前言，可另设后记说明。本凡例未及，或因选题特殊，本凡例有些条款难以适用，整理者有所变通，也可在前言或后记中酌情说明。

《乐清文献丛书》编辑部

二〇〇七年十月

前言

一

林大椿（1812—1863），出生于今乐清市翁垟镇高阳村一户殷实的书香门第。父启亨（1771—1856），嘉庆庚辰（1820）恩贡，博洽经史，擅诗文，曾执教梅溪书院。母董氏出身乐成后所名门。林大椿髫龄即师从其舅学于荷川，十七岁入郡庠，道光十四年（1834）负笈瑞安，与孙衣言、孙锵鸣昆仲及黄菊渔同游曹秋槎之门，习为时文并诗。道光丁酉（1837），始于象山之东的石氏宗祠授徒讲学，毕生菁莪乐育，及门桃李，多有建树。如以诗文篆刻名世的陈笛舟、骚坛盟主黄昆南等均出其门。

林大椿于经史百家、天文历算及阴阳术数之书靡不研精覃思。因科场失意和亲老不远游之故，在自家“三间老屋半藏书”的“菜香室”，寝馈其中，潜心学问。咸丰壬午（1858）始得选岁贡。咸丰七年（1857），他既抱丧子之痛；同治元年（1862），复遭洪扬之乱。动乱中，昔日亲友，或流离失所，或慷慨赴义。面对多灾多难的家乡，心力交瘁的他毅然拾起饱含悲愤之笔，挥涕写下耳闻目睹的一切，存心让后人歌泣。终因“怨愤相煎，遂积忧而成疾”，于同治癸亥（1863）十一月廿七日溘然与世长辞，年仅五十二岁。

二

林大椿平生著述颇丰，尤长于骈文与诗，多因未刊而散佚。从

现存诗文看，可基本反映三个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

《恒轩诗钞》与补遗诗共四百五十七首，系早期作品。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他与一班文友朝夕以品学相砥砺，或赠答，或咏怀，不乏男儿抱负，字里行间，又随处可见刻意模拟前贤，清雅平和，不激不励之风。其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吐属不凡的才华，在此期间头角初露。

“记得髫龄拜舅翁，五年负笈共西东”。林大椿舅氏董新城为道光戊子（1828）岁贡，是位饱学宿儒，道光甲申（1824）应荷川郑雨亭之聘，主讲玉溪书院（今乐清市象阳镇四板桥村井虹寺）。玉溪书院在玉溪山，水称玉溪，岩有照镜，山光水色之美，林大椿写下诸多隽永诗章，如“此间本仙境，有客得天机”（《夏日杂咏》），“一壑松声潮夜涌，半岩月色镜宵悬”、“笑来山径量松影，闲倚僧廊看塔尖”，等等。尔后，又一度携卷读于白石山中，随着学养日富，游展所至，佳作叠出。遗存沿用至今的玉虹洞集真观讖诗百首，民间相传系出他一夕之手。《登玉虹洞》诗云“佛与神仙分洞住，人随云雾入门来”，“直开捷径通三岛，时见闲云堕一楼”，词句凝练，气势豪迈，已具大家气象。而“嘱它流向江滨地，莫载人间歌舞船”、“此中都是农家粟，莫作寻常流水看”（《溪水》）等句，虽出身富有之家，却能如此贴近民情，足见少年老成。再如《望玉虹峰顶》中“留待他年做进步，者番先相最高层”，更可见其九霄非遥、指日可待的气概，等等，皆非浅学能望其项背。

施六洲所编《雁山志》十三卷成而未刊行，林大椿曾奉父命校刊乾隆以来游山名作。为此，曾专程入雁山登雁湖顶，览大龙湫，作《雁湖观日出歌》和《大龙湫歌》五古两首，气势磅礴，雷霆万钧，堪称扛鼎之作。另《拟题施六洲先生雁山志后》七绝七首，想也是同一时期先后之作。

从丁酉（1837）端午所作《竞渡词》“近来寓研石家祠，回首端阳今又迺”推算，林大椿从学瑞安约两年多。同窗之中，惟与黄菊渔唱酬往来较多。此时写下的《章安灯词》、《自章安至郡》、《舟中

望仙岩》、《题许旌阳祠》和《章安怀古》等，标示其离乐后，陶今铸古，情随境迁，日臻精熟。

比他年长十九的姑表兄郑雨亭，早年师从永嘉宿儒张筠皋，继又渡江从陈春堤学，亲炙诸名宿之教，深知经义。此人“试辄高等，顾数奇，秋战屡北”（《徐德元·雨亭明经传》），后在家授徒讲学。董新城归老后，郑雨亭复延其子董豫侯接讲玉溪书院。郑雨亭元配系南书绅之姐，南氏亡故后续弦董新城之女，与林大椿可谓亲上加亲。林大椿曾赠诗云“君婿我甥同拜舅，机云兄弟本同师”。对董豫侯，他寄望颇殷，多诗书往来，“未必吾能成宅相，可知君不坠家声”，谦抑见于言表。

林大椿曾佐徐德元等修建七里埭塘，两人志趣相投，扁舟过从，纵论时事，切磋文字，往往通宵达旦，正所谓“指点溪山秋到早，商量文字夜眠迟”（《秋日履舟过访》）。道光丁酉（1837），林大椿喜闻徐德元得选拔贡，立即寄诗两首致贺：“战胜文场壁垒开，捷书飞过大江来。海滨共喜天荒破，瓯北从今地气回，麟角才华争命数，龙门声势挟风雷。自惭未是翬霄翮，痴望云程取次陪。”两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一改平昔清淡蕴藉，读之令人神旺。

林大椿大伯启敬通文史，富藏书，四叔启清亦擅文且擅医，其从兄弟辈俱业儒，以弟就兄，以兄规弟，率多诗文互勉。如《寓中有作畧从弟宏铨并柬赵弟翼谟》“玉成士品须忧患，珍重遗书待显扬”，《寄毓山兄时设帐西岩寺》“吹埭调好谁为弟，抱璞光潜尚有君”，《送润斋兄赴秋闱》“飞雁序中观鶚荐，紫荆林内感槐黄”，奖勉双兼，规箴并用。尤其是“祖母年高母苦节，青灯照得此时心”（《示宏煦弟》），更刻画出以往学子为报亲恩而甘于寂寞苦读的自勉心境。

十九世纪前期，清政府已由乾嘉盛世转衰，内忧外患频仍，吏治腐败，危机四伏，但东瓯僻处一隅，尚少兵戈之患。因此，在早期诗作中，描述灾荒或有之，抨击时弊却绝少。为诗蕴藉冲和，于平淡中见襟怀。佳句如“雷声奔绝壑，雪影舞长空”（《观瀑》），“东风有恨眠难稳，南陌多情客正遥”（《春柳》），“波面鱼吞芳草影，渡头燕坐

落花茵”(《舟行纪事》),“半山月色僧归寺,一夜秋声雁渡江”(《新秋》);写江南暴雨天气“两边雨起严分界,四面峰来猛合围”,“水因危石激,烟被乱峰分”(《晚望》),《瞿玉堂过访》:“春生诗句里,星隐酒樽间”,以及借《镜》自喻:“纤尘须记辛勤拭,蔽却清光不在多”,借《观放竹籊》自警:“回头已觉非平地,失足须知便下流”等等。其《咏牡丹》云“名卉甘心推领袖,东风着意聚英华”,《花影》云“曾从绚丽归平淡,尽避秾华入画图”,“摩揣香韵须求淡,领略风神自在虚”,《咏帘》云“锁来乳燕春三月,遮住炉烟夜五更”,《耽吟》云“僧经入定禅方静,画到通灵墨岂浓”,《论文》云“北极有星曾号曲,西方一佛亦名殊”,对仗工巧,感悟深远,非积学而不能。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事,史家已有定论。林大椿《读秦始皇本纪》一诗,却敢于独抒己见,另辟蹊径。他认为,秦始皇所焚之书,并非儒家经典,而属沾边于儒学的“曲学”,由于“举世皆聋盲”致“卮言日蜂起”。其中仅孟子、荀子可称儒家正统,而“人众我口寡”、“摈弃不得行”,上帝惋惜,因之才假强嬴一炬廓清之。一坑数百人也少正统儒生,多借神仙妖言惑众的蠹道士。他指出,只有将这些蠹贼除恶务尽,才有真正的儒生来阐明道统,传扬正统文化。此诗与当今个别史家所论暗合,颇有参考价值。

三

《求是斋诗钞》约作于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四年,系林大椿中期作品,收绝律四十二首、五七古七十首。斋名“求是”,见证其由致知迈向格物,为人生和社会之“是”加以探索。序言中,林大椿借用秦青答薛谭语为自己的诗定位定向,“‘且子不见夫春林之黄鸟乎,飞翔乎山梁之上,栖迟乎涧谷之间,颀颀其羽,睨睨其声,只许其适乎律吕也,谓天下之能鸣者莫之及矣。洎引之以九皋之鹤,高岗之凤鸟,且自悔其所鸣之小矣。’鄙人之歌类是夫……顺性而然而无不然,是谓天籁,天籁者,真意之谓也,于鄙人乎何嫌……”

关于诗得趣在自然之旨，他曾在多首诗里重复提及。“壤歌与衢谣，文从字亦顺。此中有天籁，后起徒淆紊。悠然求其原，悟微本来性”（《与履舟论音韵》）。“李杜万丈光，妙在无字句。慧心偶得之，此中有天趣”（《偶作·一》），“里巷歌谣词，如出圣贤口”（《偶作·三》）。在林大椿看来，天籁出自自然，无雕琢掩饰，无矫揉造作，至诚故至美。这与苏轼“行云流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潜形于蓄学，根于性灵，发于激情，不假做作，要在得气源之深浅。由于林大椿平生活动面较窄，为诗缺乏大江南北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背景，所及多为平日文友间往来之晤谈和闭户读书感触而发。孙衣言曾云：“恒轩善事父母，居乡恂恂笃谨，常终岁闭门教授，不轻出，独喜读书著文”（《垂涕集·序》）。这种近乎隐居的生活，可遂其立品为尊，博学为富的精神追求，从而达到不激不励、清醇可爱的境界。故孙衣言又称其诗“清处弥华，淡处弥腴，质实有义理”，孙锵鸣则称其五古诗如聆听太古琴音。诚然，清淡有味殊难，非得先汲取秾华然后归于平淡不成。苏轼评陶云“质实实绮，瘦而实腴”，将苏评与二孙语结合起来，对清淡二字便有了实质性的诠释。徐德元称林大椿“诗学自汉魏迄元明，含英咀华而体裁典瞻，雅近玉溪生。制艺陶冶前明及国朝诸大家，而笔意类腐东老人。骈体端庄典丽，则合六朝三唐而成之也”（《明经林恒轩传》）。我读其五古诗，确乎觉得有一股浓郁的乐府韵味，出入于汉魏六朝之间。林大椿大力提倡“笔底尘埃要扫除”，重视心灵悟性，掺合释儒，最终形成有别于浮华奢靡既清淡又高古的诗风。

“生员通，林大椿”。他无书不读，且各有心得。他反对明七子止读秦汉书，立志“博览穷居诸”，底线为“撑肠五千卷”，秘诀是“要知古大儒，不徒守章句，简册既贯通，性灵兼妙悟”（《题壁自警》），那种“贪多兼精粗”不加扬弃的读书方式不是为学之道，学习的最好选择是专，“人专然后传”，又要如治水，因源而流，可得百川之大略。甘苦之言，乃后学之津梁。

《题壁自警》名为自警，兼可警人。它是基于数十年学养与阅历，并围绕如何处世做人这个核心展开的，既具个性又涵共性。通

篇水清见底，条理分明，至诚至理，引喻含义，细细读来，犹如置身天高云淡之境，廓然明爽。他强调玉不雕、竹不削和金不冶俱不能成为利器之理，以“圣贤秉上智，学问犹自强”自勉。他指出，只有正内，才可禁外，更要自律，惜福，知收敛。俭可成廉，敛可鸣高。“士节在临财，返心要自检”。君子要不矜不争，毁誉两忘。这些话在今天仍不失为警世钟声。

林大椿既重视心灵的作用，又具有朴素的唯物观。他在《赠地师》一诗说：“人人聘地师，谶记喜洋溢。究其所揣摩，十常谬六七。其家旺气来，寒谷变邹律。其家衰气来，玉盏碎千镒……恃地夺天权，此谋终难必。”他认为天地万物有它的运行规律，不为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有盈必有虚”，有消有长，有乘有除，这就是天权，人如果违背此规律，任由自己的意志转移是不可能的。

咸丰甲寅（1854）十一月初五，乐清与平阳两县沿海地区的井渠河流突然上涨，旋即复归原位，对这一突发地质现象，他释为“水由地中行，相依柔顺吉。地气既上浮，水因而奔轶”，从地质上解析既有科学道理，又有史料价值。

所谓林大椿“屡试不售”（孙衣言语）和“秋战屡北”（徐德元语），而其究竟进过多少次试场今已无从得知，所见惟《戏题试院灯笼》、《下第后见落花》和《钱塘怀古》诗可考。后者浓缩历史跨度，从“塘名记自汉时人”的汉代起，沿秦桧的卖国求荣，岳飞的冤死风波亭，贾似道的荒淫误国以及于谦之死这一历史轨迹走来，千古兴亡，正邪冰炭，悉梗概于诗。诗中“风波血地元戎死，玉帛冰天宰相荣”，“笙歌绮院春开宴，灯火青山夜品花”，“携头入地贞臣哭，借眼朝天故鬼呼”等句，是何等的感慨，何等的苍劲悲凉又不失清丽。与《感怀六首》和《感怀和石生蕴山八首》的自遣闲情，深沉稳健，自是别具格调。

孙衣言自道光丁酉（1837）与徐德元等同选拔贡后入京，十三年后中进士，嗣后宦辙往来江南淮北，相见缘少。《柬孙琴西太史》写在瑞安分袂二十年之后，林大椿对这位“文星大如斗”的昔日同

窗，当时“言笑周旋之”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将孙衣言比之灵凤，自惭骨格非偶，如遁入林藪的燕雀，捧读对方寄来的文章，一种“宝光溢户牖”和“平生燭火明，对此孔颜厚”的感叹从胸中涌起。

四

《红寇记》、《垂涕集》及补遗和《粤寇纪事诗》为林大椿晚期作品。

咸丰十年（1854）十二月十八日凌晨，虹桥瞿振汉率众九百余人起义（红巾军），在内应配合下，从水心兵不血刃进入乐城南门，清兵副将姚武城匿于民居被杀，典史赵映南抵抗被杀，都司张富文受降，县令康正基仓皇遁逃。瞿振汉入城后，立即发布告安民并历数官吏害民种种，继之抄了廩生徐牧谦家。徐牧谦、徐乃康父子乘间逃脱。徐乃康逃至石马被执，押回羁禁；徐牧谦逃至吕岙亦被执，旋获救，渡江向瑞安孙锵鸣求援。瞿振汉复遣人潜入温州联络党羽，约期攻城，事泄，党徒被杀，温州全城戒严。瞿振汉知攻郡城无望，大荆、磐石清兵已严守以待，料孤城难守，遂计划于廿四日掠资入海，事又泄，城中居民大惧，杀机暗萌。廿四日上午，恰有挑担者过东门为瞿党所伤，声哗众聚，瞿军解纠失策，遂致一人振臂，全城响应，顿时势如潮涌，喊杀连天，居民纷纷持菜刀农具见瞿军便杀，瞿军不敢抵抗，俯首就戮。仅上午半日，包括瞿振汉等首领在内的一千四百余人全部被杀，鲜血染红城内大街小巷，河水为之赤。短短七天事变，死杀之惨，成为吾乐历史上继元兵入境后又一次惨烈的生灵浩劫。

林大椿妻子徐氏是徐牧谦堂姐，与当时相关部分士绅亦有一定关系，对瞿振汉举事内情知之甚详。《红寇记》一书，较为客观地记述了当时的所见所闻。

瞿振汉起初仅借办团练解脱经济困境，并无“谋天夺国”之心，对刘锐、傅礼淮之游说尚在犹豫之中，后经金佩荃怂恿，始坚定了举旗的决心。他的失败纯属势力单薄，入城后虽接管城关，但迫降清兵仍在城中，潜在危险尚未解除，义军又多因饥寒所迫，既非训